

# 视觉周刊

这组《少年“派”》拍摄于杭州的街头巷尾,20个孩子在20个不同的特定环境中,真实的人脸被隐藏,代之以平板电脑中的头像,试图以此形式反映一代人在无孔不入的“移动互联网时代”自我的迷失。

科技的发展使网络这个虚拟空间蔓延到生活的每一处,对年少一代的影响尤为明显,他们一头栽进那个似乎所向披靡的“空间”。眼睛在天堂,身体却在破旧的危房。现实和虚拟是如此的悖离,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割裂了现实的温情。当我们在网络世界中畅所欲言时,也是现实世界失语的一刻。派即是一种隐喻。“派”里的孩子即是自觉不自觉的成了“套子”里的人。

摄影:汤丽丽 撰文:郑梓煜 南都供稿

## 屏幕是我们的深渊

没有谁能否定当下已是移动终端的天下,手指与屏幕的交互,创造了一种席卷一切的趋势,屏幕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介质、载体或者工具,它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方式与便捷程度,而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“器官”。在某种程度上,屏幕所承载的一切塑造了当下许多人的认知世界,一个虚拟却又如影随形的、以社交和娱乐为基本内容的世界,它无限通达无孔不入,代替了那个我们的肉身寄存其间的现实世界。那些我们原本以为仅仅是一种时髦形式的东西,也已渗透进生活的躯体,成为生活本身。

当情侣在饭店吃饭时不再交谈,而是与平板电脑和手机交流,当全家聚会时集体失语忙着回微信,当夫妻楼上楼下叫吃饭也要发微信的时候,现代科技是怎样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?这组作品用一个简单明了的视觉替代手法,场景的营造旨在凸显现实的窘困与虚拟世界的幻觉之间的反差,以此呈现科技对人的异化。

移动终端总是以促进情感交流的面目推销自我,现实却是我们越来越相对无言形同陌路。我们尽情点赞、慷慨“献花”、随手“点蜡烛”,慢慢的七情

六欲喜怒哀乐似乎只有在虚拟的社交空间里才能自然流露。每个呵、哈、呀、嘻等象声词以及龇牙咧嘴的表情背后,可能都是一副麻木的面孔,再多的心灵鸡汤也无法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疏离。

移动终端让世界任何角落的信息都瞬息即达,唾手可得,我们在乐此不疲的“围观”中维持着一种与外部世界的“热切”互动,维持一种“我们与世界同在”的仪式感,去隐匿内心的孤独与荒芜。我们通过转发评论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新闻表达关切、区分敌我、展现学识与幽默,却对近在咫尺的现实问题失去了感受力与行动力。移动终端让游戏不再需要特定的时间地点设备,一个简单古老的“打飞机”游戏只因加入了朋友间的分数竞赛便可一夜之间让多少人废寝忘食,当你对它厌倦,早已有更多的游戏在等候着吞噬你的时间,让你亢奋也让你疲惫。轻量化、社交化的“无脑游戏”让很多原本对游戏不感冒的人也沉溺其中。

如果仅仅基于一种工具理性,我们可以用移动终端做所有严肃而有益的事,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像携带着一个移动图书馆那般阅读,可以更高效地工作沟通创造价值。但无奈

的是,随时随地做有益的事往往更像一场修炼,需要决心定力毅力,而只有“无益”之事轻而易举地让我们沉沦上瘾。更何况,信息的实时推送与海量投放已经让我们无暇思考,消费主义天然散发着令人亢奋上瘾的神奇气息。

这让我们想起传播学者尼尔·波兹曼在他的《娱乐至死》的前言中所对比的那两个著名的预言:乔治·奥威尔的《一九八四》和奥尔德斯·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,“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,而赫胥黎则认为……人们会爱上压迫,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……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,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;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,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、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……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”。

这是两个具有绝世洞察力的预言,但更容易成为现实的是后者。揭示这一问题,并非基于一种“反科技反娱乐”的保守立场,更不是鼓吹回到结绳记事飞鸽传书的年代,而是在汹涌而无孔不入的科技大潮面前,竭力保持一种审慎反思的人文精神。



张玉媛,8岁,杭州盛家弄。



姚晨,7岁,杭州坤年里。



蔡琦,13岁,杭州望江门外坤年里。



芮剑,8岁,杭州南兴儿巷。



李彦,10岁,杭州三角道废弃的铁道。



王礼杰,8岁,杭州新荷花弄。